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一輯

龔鵬程 主編

第9冊

唐宋陶學研究(下)

黃惠菁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宋陶學研究(下)／黃惠菁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目 4+244 面；17×24 公分（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一輯；第9冊）

ISBN-13：978-986-7128-92-8（全套：精裝）

ISBN-13：978-986-7128-80-5（精裝）

1.（晉）陶淵明明—作品研究

851.432

96003132

ISBN - 9867128805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一輯 第九冊

ISBN：978-986-7128-80-5

唐宋陶學研究(下)

作 者 黃惠菁

主 編 龔鵬程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 年 3 月

定 價 第一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唐宋陶學研究（下）

黃惠菁 著





目 錄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陶學概說及其發展進程	1
第二節 論題旨趣與研究方法	4
第二章 唐宋文學思想形成之外緣環境	9
第一節 政治變化	10
第二節 思想風貌	27
一、儒學的新變	28
(一) 儒學的轉折	28
(二) 新學風的形成	30
(三) 理學的興起	33
二、禪佛的盛行	36
(一) 禪悅情趣	36
(二) 詩禪相通	41
三、三教合流	46
第三節 文化發展	55
一、學術研究的盛行	57
二、藝術創作的蓬勃	61
三、文士交游的頻繁	65

第三章 唐宋文學思想形成之內在因素	73
第一節 文士的心理結構	73
一、進取與隱逸	73
二、狂放與適意	84
三、曠達與忍讓	98
第二節 文士的審美認知	109
一、道統與文統	111
二、人格與風格	135
第四章 唐宋有關淵明生平事跡之考論	151
第一節 生卒年代與背景	152
一、時代環境——豪強相凌，戰亂流離	152
二、社會現況——民疲田蕪，杼軸空匱	165
三、生卒年壽——歲惟丁卯，律中無射	173
第二節 家世里居與生平	177
一、名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177
二、世系——悠悠我祖，爰自陶唐	180
三、里居——行行循歸路，計路望舊居	188
四、生平經歷	192
（一）少年懷抱——猛志逸四海	192
（二）青年出仕——一心處兩端	194
（三）中年歸田——復得返自然	202
（四）晚年守節——固窮夙所歸	205

下 冊

第五章 唐宋有關淵明思想人格之述評	209
第一節 儒釋道傳統思想的聯繫與反撥	209
一、儒家士君子風範的充備	211
二、道家個體自由風度的展現	221
三、佛家生死形神觀點的質疑	226
第二節 人生進退抉擇的衝突	233
第三節 人生妙境理想人格的建立	244
一、生活態度——任真自得	244

二、生活實踐——守節固窮·····	261
三、人生把握——高曠淳厚·····	270
第六章 唐宋有關淵明文學作品之品評·····	283
第一節 文學淵源·····	284
一、歷史承繼·····	284
二、文學環境·····	295
第二節 作品內容·····	303
一、詠懷詩——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303
二、田園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314
三、哲理詩——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	321
四、辭賦與散文——常著文章自娛，頗示 己志·····	326
第三節 藝術表現·····	341
一、語言簡樸·····	342
二、意在言外·····	348
三、理在其中·····	352
四、意與境會·····	355
第四節 創作風格·····	361
一、率真而自然·····	361
二、平淡寓豪放·····	367
第七章 唐宋文士學陶之軌跡與意義·····	375
第一節 淵明的文學成就與地位·····	375
一、從詩史角度出發·····	376
二、從詩歌體派形成檢視·····	383
第二節 淵明及其作品對唐宋文士的影響·····	391
一、思想行誼方面·····	391
二、創作著述方面·····	403
第八章 結 論·····	419
引用及參考書目·····	431

第五章 唐宋有關淵明思想人格之述評

第一節 儒、釋、道傳統思想的聯繫與反撥

關於陶淵明的思想背景，歷來存在著各種對立的意見，首先展開這種討論的是宋代，這是因為宋代學術界特別重視文與道的關係，所以對於淵明思想的出處，也就表現出濃厚的討論興趣。他們分就中國思想的三大領域——儒、釋、道，來探討淵明的思想歸依。有的主儒家，有的歸道家，更有入佛家者。概括而言，諸家之說不免失之片面，因為淵明是一個「形逐物遷，心無常準」（〈扇上畫贊〉）的達人高士，而不是一個思想家。他和其他許多文藝作家一樣，在時代政治、社會思潮下，並非單純接受某一種思想流派的影響。對任何一個門派、學說，他也沒有心存主觀好惡，誠如顏延之所稱，其「學非稱師」（〈陶徵士誄〉）。從其讀書的過程，更可以理解他這種兼容並蓄的襟懷。「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從其詩文援引的古典文獻資料來看，所謂「千載書」，除了通稱為「六經」的儒家經典及《論語》外，還有《老子》、《莊子》、《楚辭》、《淮南子》、《史記》、《漢書》、《列子》等，甚至包括古代神話傳說的《穆天子傳》、《山海經》，或史傳文學，如皇甫謐的《高士傳》、劉向的《列仙傳》及《列女傳》等，十分廣泛。足見蕭統〈陶淵明傳〉稱詩人「博

學，善屬文，穎脫不群」，洵非溢美之辭。

從後代史實與淵明詩文中，可知詩人只要「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他歷覽諸子百家典籍，從中博采眾華，結合當時政治、經濟和生活環境因素，融鑄成自己的思想，這種思想其實正是多層深厚文化傳統的積澱，並非是對前代某一家的單純繼承或對幾家的簡單綜合，而是經由自己豐富的人生閱歷和高超的智慧融鑄而成，其中既有著個人的獨特色彩，也不乏時代的共同精神。所以，硬是派定淵明為「儒」，或「道」，甚至是「佛」，都不免有削足適履之嫌。更何況儒、釋、道思想之間的界限、分際，有時亦不是壁壘分明，互相對立的，看似水火不容，其實又是可以互相補充的，這種相互的融攝、溝通，基本上是無法決定出先後、輕重之分的〔註1〕。它們緊緊地依附在詩人的身上，或重疊，或覆蓋，或隱或顯，卻自始至終，未曾消褪。不論是採「先儒後道」，或主「內儒外道」之見，或以某一家典籍出現的數據統計，來力證淵明思想的強度，都不能如實地反映詩人的思想本質。宋人未察，往往因個人思想立場、精神情懷，而將淵明引為同調，或以簡單的幾篇詩文，進而斷言詩人的思想淵源。這些意見，雖然不無珠璣者，但總的來說，仍失之片面，不夠周全，不免淪為「管中窺豹」而「不識大體」！受到後來明清學者不少批判。

〔註1〕 淵明的思想既有儒家的色彩，也有道家的影子，甚至其他思想的滲入。各家思想在經過他個人的涵融後，已化為自我的人生特質，而無所謂先後、輕重之分。以功名態度來說，其早年既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五柳先生傳〉）的表現，又有好讀書，「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的懷想；中年以後，傾吐過「四十無聞」、「白首無成」（〈榮木並序〉）的恐慌，也詠唱過「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的自慰；晚年雖有「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的淡然，也不乏「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其四）的不悔。可見，在淵明身上，我們隨時可以看到儒道的交互作用，時而顯，時而隱，難言孰為先，孰為後，或孰為內，孰為外。

爲了清楚呈現宋人在陶學思想上認知的紛歧，我們特就三家思想的主要範疇，分別立說，藉此一探淵明與各家思想的聯繫與反撥情形，以及宋人所持的觀點的基礎所在。

一、儒家士君子風範的充備

魏晉時期文士的意識思想形態，主要是圍繞著玄學與道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則是長期處於弱勢地位，影響相當有限。到了東晉末期，因中央政權已漸趨薄弱，其思想上對人民的鉗制，較之以往也就鬆動許多，思想領域便顯得特爲活躍。當時文士間不乏潛心儒學者，如范寧和范宣兩人，即以積極講誦經書的行動，推展江州一帶的儒學，普及當地的儒術，勤心矯正時風。這種努力確實影響到一些具有儒學家世背景的文人，陶淵明思想性格中的儒家傾向，即是與當時社會的部分人士的努力傳播，有著密切的關係。

淵明儒家思想的形成背景，除了因緣於小環境的影響外，其中家世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促因。曾祖父陶侃在東晉即是尊崇儒學，反對老莊之言的代表人物。侃出生孤貧，但從小就有「遠概綱維，宇宙之志」，年輕時曾受到司空張華的讚美：「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以上見劉孝標注《世說新語·言語》引〈陶氏敘〉）其一生可以說是相當重視功名事業，勇於進取，據史傳記載，他確實是一個勤於政務、孜孜不息的人，其中所具有的儒家色彩，十分鮮明：

終日斂膝危坐，閭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晉書·陶侃傳》）

不惟如此，他亦曾不假顏色地痛斥：「老、莊浮華，非先生之法言。」批評「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的所謂「宏達」行爲。所以當時尚書梅陶在與親人曹識論及陶侃時，特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以上均見《晉書·陶侃傳》），相對於時人的自棄放蕩，不僅不能「兼濟」，也無力「獨善」來看，陶侃這種以「兼濟」做爲個體生命的價值實現，其中積極奮發處，就顯得特別突出。

受其影響，淵明的生命氣質也帶有幾分這種特質。他屢次在詩文中寫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飲酒〉）、「徂年既流，業不增舊」（〈榮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雜詩〉）、「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同上〉），這些都是其對時光縱逝，一事無成的恐慌。結合陶侃在光陰把握上的觀點：「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來看，可以發現他們思想的一致性，這與孔子當初在川上，嘆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亟思有所作為的精神情懷，其實正是遙遙相契的。所以宋人黃徹特別指出，由詩人對時化推遷的敏感來看，其「非愛枯槁」是可以確定的，其中除了有亟思奮發之念外，也同時傳達出自己對時人「急於聲利」之舉的不滿與傷情（《溪詩話》）。黃氏的這個看法，誠然符合淵明的詩旨所在。

陶淵明的少年時代，物質生活雖然貧困，但精神生活卻是十分豐富。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干寶《晉紀總論》）的兩晉時期，他不僅像一般士大夫一樣，學習《老子》、《莊子》這些必讀的玄學經典外，還學習了儒家的「六經」。在〈飲酒〉詩中曾自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游好」兩字，就點出了他對儒家經典的喜好態度。這種喜好的態度、本質，誠如其在〈五柳先生傳〉中所提出的「好讀書，不求甚解」一樣，並非鑽研於字句訓詁，而是側重於與古人心靈精神的「會意」處，其中所具有的實踐意義，與漢儒們的皓首窮經，謹守章句之學，乃至依傍終身而不敢稍離，是大相徑庭的。他雖然仰慕孔子，但這種發自心底的肅然崇敬，是在理性的、客觀的認知下，油然而生的。他好古而不迷古，尊重前賢，而不盲從先哲。一方面他尊奉孔子為「先師」，以其遺訓自我勉勵：「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感士不遇賦〉）、「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其四）；一方面，他並不把這種遺訓當作精神桎梏、不敢冒犯，而是從理性生活的實踐中，去進行反省與調整：「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因此，從孔子遺訓中，他往往能夠比

時人汲取更多的生活智慧和人生信念。

例如在〈詠貧士〉中，詩人嘗以仲尼等前賢自比。在〈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中亦曾云：「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不論生活的阻力、壓力有多大，他始終堅持儒家的這種「固窮」原則，不肯爲五斗米折腰。貧困愈甚，意志愈堅，所謂「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傾壺絕餘粒，窺灶不見煙」（〈詠貧士〉其二），他坦然面對，不時以「固窮」自勵：「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飲酒〉其二）、「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詠貧士〉其七）、「固窮夙所歸」（〈有會而作〉）。即使「貧富常交戰」，他也能做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其五）的境地，畢竟君子在「寧固窮以濟意」（〈感士不遇賦〉）下，又怎能「恥惡衣惡食」（《論語·里仁》）。

從淵明的行爲來看，他的確有著「士志於道」的精神品質。不過，「惡衣惡食」終究仍具有「衣食」之實，只不過是粗糙、拙劣罷了。對要求不多，「但願飽粳糧」（〈雜詩〉其八）的淵明來說，堅持「固窮」的意志，許多時候還是不能從根本上去改善自己貧窮到「不足」、「寒餒」的可怕境地，當一個人生命的存在，儼然受到死亡威脅之際，仍侈言「守道」，放言「持志」，不謀經營之道的話，恐會讓人有冥頑不通之感，也有標新以爲高之意，這總是不切人情的，所謂「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所以，淵明在「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賦〉）的前提下，選擇勇敢地承擔現實，先將「憂道」擺一邊，開始投身田耒工作，來解決實際的溫飽問題。詩人就是以這種面對現實，毫不矯情的作爲來看待孔子的遺訓。表面上，似乎與孔子精神理想稍有相左，其實，這種生活態度是更能符合孔子實事求是的精神真髓。

除了「守節固窮」方面體現了淵明承襲儒家思想的人生自處模式外；在「進德修業」方面，詩人其實也是積極不落人後的：「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

遙，孰敢不至。」（〈榮木〉）這種用世之志，其實一直存在於詩人心中，即使在他選擇「擊壤自歡」後，它仍然隱隱存在。所以，當詩人邁入不惑之年，卻未能有建功立業之成時，他不禁要責備自己的廢學耽飲。從年少的「總角聞道」，到如今的「白首無成」，頗有「情何以堪」的味道。對照詩人年輕時的鴻鵠大志：「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擬古〉其八），今日卻不得不終老田園，還是不免有幾分「時不我予」的感傷。雖然「丘山」向爲本性所愛，走向田園，亦爲其所樂，自己也能在這些過程中保持超然物外的情懷。但是，曾祖父的典範行爲，儒家思想的催發，廣大生民的有待關懷，都教詩人又有一些責無旁貸、「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在完全歸隱後，他還是寫下「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讀山海經〉其十）一類金剛怒目式的文句，甚至還帶有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悲壯豪情，如〈詠荊軻〉。可見詩人未曾忘懷於「大濟蒼生」的理想，他努力奮發過，卻因個人「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與子儼等疏〉），發現大時代已然「真風告逝，大偽斯興」（〈感士不遇賦並序〉），所以，才選擇了「擊壤自歡」的生活道路。這一種出處抉擇，與儒家「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的人生信念，基本上還是一致的。也因此，造成許多唐、宋文人在解讀淵明的心理結構時，特別喜歡在「孤憤節義」這一點上，提出自己的體會。

例如顏真卿，一生忠貞，其詠陶之作蓋爲借古寄懷，目的乃在抒發自己持節不屈的心志，所以有「嗚呼陶淵明，奕代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栗里〉）之句。又如宋人湯漢，以爲淵明詩中雖然「言本志少，說固窮多」，但因其能堅守固窮，能「忍於飢寒之苦」，而後才能「存節義之閑」。就這一點而言，自然要比那些「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卻貪嗜榮祿，競事豪侈的俗士高明許多（見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諸本評陶彙集》）。另外，真德秀也指出：細玩淵明文辭，「時亦悲涼慷慨，非無意世事

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跋黃瀛甫擬陶詩〉）顯然真氏是企圖在爲淵明「忠晉」之說，提出更有力、更深刻的思想依據，這個依據即是儒家的彝倫觀、慎終追遠的思想紹承。真氏以爲正因爲淵明有著根深柢固、牢不可破的儒家思想，所以在時不我予、「獨以力不得爲」的情形下，只好選擇「肥遯以自絕」。不過，雖已退隱，卻仍有至深痛切的「食薇飲水之言」，和「銜木填海之喻」，而這又何嘗不是淵明始終不渝的心志告白？看來，宋人藉由讀陶詩而想見其人，其實，許多時候，又何嘗不是因愛其人格而喜讀其詩乎？

此外，在宋代有著相近似體會的，還包括向來認爲淵明思想出於老、莊的朱熹。從《朱子語類》中，我們可以看到，朱熹也特別欣賞詩人這種「忠憤」情懷，以爲其中可以上接張良當初一心救韓的義行：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衡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功名事業，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遼、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儵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向薌林文集後序〉）

朱熹治學，主張「尊德性」與「道問學」互相成全，互相發明，因此，其對人格與詩品一致性的要求，也就特爲強烈。上文他通過淵明與紀遼、唐林、王維、儲光羲的比較分析，指出只要曾向強權暴政妥協、

屈就之詩人，其人格必然會沾上污點，如此一來，即使其詩歌「邈然清遠」，創作再為辛勤，亦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不似淵明，即使歷困厄也不改初衷，守善道而堅貞不屈，節慨之高與語言之妙，相互映襯，是個體生命價值高度統一的呈現。這一點，實非「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的王維等人，所可以抗衡、比擬的。

朱熹這種看法，實際上是超出單純的文學研究範圍，而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宋室南渡之後，許多愛國志士和作家的政治理想，都是放在收復中原、重整河山的議題上，在他們身上不難發現高漲的愛國熱情和強烈的民族意識，不少作家即是以激清飛揚的氣勢和深情沈鬱的感嘆，抒寫忠憤填膺的壯志和憂國憂民的悲慨。流風所及，即使強調道德人格修養的理學家，也不免有慷慨昂揚、恃才驕氣的另一面。朱熹的父親朱松，就曾因上書反對秦檜議和而遭到迫害，這種打擊，不僅未使朱熹噤若寒蟬，反而使其在立志改革社會弊病的決心上，顯得更為堅定。當時宰相湯思退力倡「和議」之際，他仍義無反顧地上書與孝宗：「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宋史·朱熹傳》）一再陳述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要求「罷黜和議」、「追還使人」、「任賢人」、收復失地（〈壬午應詔封子〉）。這種對現實的強烈關注，顯示出他絕不是一個但言「正心誠意」，卻行為枯槁、不通情理的儒士。

由此可以發現，理學家除了立功、立言的要求外，更留心的是立德方面的修養。他們以儒家的倫理學和心性學來評文論藝，將文學思想導向對主體道德人格的絕對肯定，文學批評成為對作家思想動機善惡、人格行為是非等道德倫理價值問題的評判，而文學藝術成就的高低，也就從中有了定奪。例如朱熹嘗作〈記孫觀事〉一文，尖刻地諷刺了孫觀變節投敵之舉。孫觀工詩文，與汪藻、洪邁、周必大齊名，乃翰林學士，然其詩文卻因人品之低劣，被時人所不齒。朱熹視淵明為高山，待孫觀為糞土，完全是從人格的角度出發，做出看待之別。這種觀點幾乎是南宋忠愛文士的共識，他們之所以

愛陶，也是因為從陶詩中，可以汲取到精神的營養，用來鑄造自己的人格。朱熹一生積極入世，志在改革，思法孔子，「以其學易天下」，渴望像張良、孔明、范仲淹一樣，施展一己長才，報效國家，斥責秦檜一類奸臣：「久專國柄，內忍事仇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其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毀秦檜生祠文告〉），這種言論、思想，適足以說明朱熹是一個具有憂患意識與進取精神的思想家。同淵明一樣，目睹南宋的政權國勢之危，他無力為之，也僅能將其滿腔憤鬱之情，貫注在《韓文考異》、《楚辭集註》、《楚辭辯證》等著作上，借注解韓愈、屈原的詩文，來抒發自己「繾綣惻怛」的愛國之情。正因他是一個以氣節自許、以國事為憂的知識份子，所以，當其過世消息傳出時，雖然偽學之禁方嚴，其門生故舊多不敢前去弔祭，然辛棄疾卻顧不得朱熹生前被誣指「結黨營私，圖謀不軌」，名列「偽學逆黨」之首的罪名，甚至韓侂胄的禁令，特作祭文獨往弔祭，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宋史·辛棄疾傳》）陸游亦有〈祭朱元晦侍講文〉曰：「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饗。」在以道德為主體的南宋時代，朱熹本持著對淵明精神的神往，塑鑄自己的生命價值，這種跨越生死，不計利害的精神上契，益發使得其人具有超道德的人格境界之美！對處於民族危機中的南宋來說，詩人這種傾向道德、節操的文化哲學意識，可說是具有時代意義的。

除了用世之心外，其實淵明的生活態度也具有十足的儒家風味。孔子曾云：「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這是從道德上來立說，主張士人不應以追求物質享受為人生目標，蓋「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憲問〉），士人是不當貪戀安逸舒適的生活。不過，這並不等於說孔子是喜歡「惡衣惡食」者，他只是在物質享受和精神陶冶的兩擇中，強力主張後者的重要性。以〈述而〉篇所提及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配合來看，更可以明

白儒家理想士人的典型，絕不是一個只會背誦聖賢遺文的書呆子。除了志向於「道」外，在行為實踐上，他還必須能夠「據德」、「依仁」，甚至「游藝」，這些都是「志於道」的手段內容，所以，在《論語》一書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從容於經典史籍的夫子，也看到一個喜愛山水，熱心漁獵，甚至在音樂方面也能並臻絕詣的聖人形象〔註2〕。可見，孔子也是一個能夠享受生活的人，尤其在愈艱困、惡劣的環境中，他愈能以這種精神陶養來保持生活的興味：「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述而〉）、「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富足時，有樂處，清貧時，亦有樂處。

淵明何嘗不是如此！他對生活的要求，也是一切從簡，但求稱心，所以僅僅「揮茲一觴」，也能「陶然自樂」（〈時運〉）。從他自云：「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答龐參軍〉）便可了解詩人的歡娛所由，不是華屋，也不是玉食，更不是權勢，這些「人之所寶」者，對詩人而言，卻是「尚或未珍」。真正令他「歡心孔洽」處，或彈琴，或詠誦，或灌園，生活雖然簡單，卻極充實。田園生活細節，都足以讓他領略人生樂趣：「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歸園田居〉其五）、「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移居〉其二）。不論是鄰曲的「素心人」，還是「學語未成音」的弱子，甚至是「好聲相和」的「翩翩飛鳥」、「涓涓始流」的清泉，「欣欣向榮」的古木，都教詩

〔註2〕孔子的這些形象，均可由《論語》一書中，逐一勾描出來。例如〈述而〉篇，記述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從中透露出孔子的藝術心情；又如〈雍也〉篇：「知者樂山，仁者樂水。」想像孔子徜徉山水的悠然，既是知者，也是仁人；再如〈述而〉：「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是一種陶然的逍遙，並非志在漁獵，所以也不會有「趕盡殺絕」的意想。這些都顯示出孔子絕非枯淡之人，他的人生是充滿仁人君子的自在魅力的。

人有著生活的感動。儘管物質生活偶有匱乏，但是詩人早已表明「過足非所欽」（〈和郭主簿〉其一），一些蔬菜、稻穀，幾斗酒，便已足夠，「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同上〉）。這種樂在其中的精神情懷，自是儒家一心追求並極其贊賞的人生境界。

另外，我們也發現，選擇「擊壤自歡」後的淵明，其生活不僅相當淳樸，而且又極富人間情味。在鄭重的發出「請息交以絕遊」的宣言後，接著表達出「悅親戚之情話」（〈歸去來兮辭並序〉）的渴望。這段自適自得的日子，或與鄰曲「但道桑麻長」，或與素心人「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其一）。在本持著「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雜詩〉其一）的認知下，詩人無不展現出儒家可貴的人道情懷，其寬厚對待毫無血系之親的僕力，就是最好的說明：

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蕭統〈陶淵明傳〉）

在魏晉講究門閥世第的風氣下，階級之分謹嚴，所謂「計資定品」，鮮有人敢於破除。淵明以實際行動，表示對云云眾生的同等關懷，人權的尊重，即使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僕力，也能出之以為人父、為人母的憐恤，更遑論其他具有親友、手足與骨肉之實的關係者。所謂「良朋悠邈，搔首延佇」（〈停雲〉）、「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與殷晉安別〉），這是對親友的眷眷情思；「恩愛如同生」（〈悲從弟仲德〉）、「斯情實深，斯愛實厚」（〈祭從弟敬遠文〉）、「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別常情」（〈祭程氏妹文〉），這是對手足的不忍情傷；「大懼止稚子」（〈止酒〉）、「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命子〉）、「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和郭主簿〉其一），這是對骨肉的抵牾情深。誠如〈與子儼等疏〉中所稱，詩人一直有著「四海皆兄弟」的強烈情愫，即使在努力「忘情俗累」下，也「未有置天性之愛於膜外」者（明人張自烈《箋注陶淵明集》）。這種既淳厚又樸實的人情味，除了煥發出儒家「民胞物與」的光環外，也一再顯示出